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 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

STUD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曹道衡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 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

STUD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曹道衡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曹道衡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5004-5986-6

I. 南… II. 曹…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南北朝时代 (420~581)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1160 号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郭娟

封面设计 孙元明

技术编辑 李 建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13.75 插 页 2

字 数 219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为迎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我们将历届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的部分获奖著作重印出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的首批图书向建院三十周年献礼。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绪论 .....               | (1)  |
| 第一节 南北文风异同说的提出 .....       | (3)  |
| 第二节 关于南北文风差别的时间断限 .....    | (8)  |
| 第三节 怎样看待南朝文学和北朝文学 .....    | (11) |
| 第四节 对北朝文学评价不高的原因 .....     | (15) |
| 第二章 历史的回顾 .....            | (20) |
| 第一节 统一的中华文明之形成 .....       | (20) |
| 第二节 大一统时代的地区差别 .....       | (25) |
| 第三节 从汉至西晋的几个不同地区文化状况 ..... | (32) |
| 第三章 汉魏学术思想的变迁与南北文风 .....   | (41) |
| 第一节 儒学的独尊与“今文经学”的兴衰 .....  | (41) |
| 第二节 “古文经学”的兴起及其局限 .....    | (46) |
| 第三节 儒学的“衰微”和玄谈的兴起 .....    | (54) |
| 第四节 玄学的兴起及其与地域的关系 .....    | (58) |
| 第四章 南方的文化传统 .....          | (64) |
| 第一节 南方的地理环境与民俗文化 .....     | (64) |
| 第二节 南方的发展与土族的形成 .....      | (68) |
| 第三节 南方的儒学 .....            | (72) |
| 第四节 江南的道教和佛教 .....         | (78) |
| 第五节 三国西晋南方文学的发展 .....      | (85) |

|                            |       |
|----------------------------|-------|
| 第五章 南朝文学发展的社会原因 .....      | (90)  |
| 第一节 门阀士族的变迁 .....          | (90)  |
| 第二节 南朝士族的内部矛盾 .....        | (94)  |
| 第三节 南朝士人的生活方式 .....        | (98)  |
| 第四节 建康——南方文化的中心 .....      | (103) |
| 第五节 南朝文风向各地的传播 .....       | (108) |
| 第六章 南方文学的几个主要题材 .....      | (115) |
| 第一节 玄言诗和玄谈的影响 .....        | (115) |
| 第二节 山水诗的兴起及其历史地位 .....     | (123) |
| 第三节 “永明体”的产生及其作用 .....     | (126) |
| 第四节 “新变”和“宫体诗” .....       | (129) |
| 第七章 河朔的文化传统 .....          | (132) |
| 第一节 河朔的地理环境和民风 .....       | (132) |
| 第二节 河朔文化的兴起 .....          | (137) |
| 第三节 凉州文化的影响 .....          | (143) |
| 第四节 南方文化对北朝的影响 .....       | (145) |
| 第八章 北方的生活情况及文化的衰落 .....    | (150) |
| 第一节 “五胡乱华”的性质 .....        | (150) |
| 第二节 十六国北朝人民生活的特殊方式 .....   | (156) |
| 第三节 北朝的学术和宗教 .....         | (161) |
| 第四节 北朝前期士人生活状况对文学的影响 ..... | (168) |
| 第九章 孝文帝迁洛与北朝文学的兴起 .....    | (172) |
| 第一节 鲜卑拓跋氏汉化的历程 .....       | (172) |
| 第二节 汉化和迁洛所引起的新矛盾 .....     | (175) |
| 第三节 北齐文学与北周文学的不同 .....     | (183) |
| 第十章 北朝文学的特点和得失 .....       | (188) |
| 第一节 北朝文学的特点 .....          | (189) |

|                     |       |
|---------------------|-------|
| 第二节 北朝文学的长处和短处····· | (192) |
| 结束语·····            | (199) |
| 原版后记·····           | (204) |

## 第一章 绪论

关于南北文风的异同是历来研究南北朝文学史的人所早已注意到的老问题。但是，在历来的文学作品选本和文学史著作中，所着重选录和论述的，大抵仅仅限于南朝的作家和作品，涉及北朝的作品甚少，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乐府民歌和极少数几篇骈体应用文和为数更为式微的文人诗，与同时的南方作家作品相比，几乎还不到十分之一<sup>①</sup>。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当时北方作家和作品存留者本来很少，好作品也确属罕见，因此不受后人的重视也不足怪。我们试看《隋书·经籍志》中所著录的北朝魏、齐、周三代人的文集，其数量就远不足与南朝相比，甚至其总和还不如南朝四代中存书最少的陈代，这就很清楚了。这种情况，似乎并不限于文集，同样地像传统所分的“经”、“史”、“子”三部分典籍，情况和“集部”也没有多大区别；特别像“经部”，其悬殊程度尤为突出。这一切是不是说明北朝的文化远不如南朝发达呢？如果是这样，又由于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很有探讨的必要。因为《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籍，大抵是隋代统一中国以后，把北方旧藏的图书和收缴到南朝所存的藏书以及在民间搜集起来的书一起藏于洛阳。其中北朝藏书中，隋的代周是出于宫廷政变，根本没有在京城长安动用武力，自然谈不上什么破坏；周的灭北齐，其实也是势如破竹，在齐都邺城未遭抵抗，也不会对图籍有什么损毁。至于南朝的藏书，情况就不同了。根据《隋书·牛弘传》所载牛弘上表隋文帝建议广收典籍的奏疏中说，北朝的国家藏书，本来很不丰富，比南朝相差甚远。南朝的藏书经晋、宋、齐直到梁代，其藏书数量相当可观。所以《隋书·经籍志》中经常说：某书若干卷；又注云：梁若干卷。其中梁代卷数远多于隋时所存卷数。如“建安七子”中的《陈琳集》，梁代有10卷，到隋时只存3卷；《应场

---

① 这样说当然不包括由南入北的某些作家如庾信、王褒和颜之推等。



集》，梁代有5卷，隋代只存1卷；晋代《左思集》，梁代有5卷，隋代只存2卷；《陆机集》，梁代有47卷，隋代只存14卷。其他作家的集子，梁代尚存而隋代已佚的为数也很多，“经”、“史”各部的情况也大致相类似。我们知道，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梁代末年图书经历了两场浩劫：一次是侯景之乱和梁将王僧辩平乱时的战火，焚毁了建康宫殿中的不少藏书；一次则是王僧辩把残余的部分送到了江陵，梁元帝萧绎曾命庾信、颜之推等人加以整理，但不久又因西魏军攻克江陵，萧绎在被俘杀的前夕放火烧毁藏书，以致受到了更惨重的损毁。这样，隋代的藏书就比梁代要少得多。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还由于北朝各代的鲜卑族统治者对典籍的收藏很少关心过，除了北魏孝文帝以外，此前的献文帝以前各朝和后此那些出身“六镇”军阀的北齐、北周统治者也是这样。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北朝文化不如南朝文化发达的一种表现。但一个时代的文化兴衰，并不完全决定于几个帝王的意志，如果据此笼统地断言北朝文化落后，恐也不完全确当。因为迄今所见北朝的书法、雕塑等都有其不同于南朝的特色。北朝学者所作的《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齐民要术》，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说明北朝统治者虽大多不重视学术和文化，而私家的著述还是存在，也未必没有人进行过文学创作，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保存下来。因为后来的学者和文人在搜集、整理和使用这些图书时，可能还存在有“重南轻北”的偏向，这很值得研究。因为像唐初孔颖达所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其所采的说法大抵出于南朝学者，而对北朝人的学说所取甚少。其实像北周的经学家熊安生卒于周武帝宣政元年（578），下距隋文帝代周不过三四年光景，他关于《周礼》、《礼记》的著作，在《隋书·经籍志》中就不见著录，贾公彦作《正义》也未加采择。至于文学方面，保存作品较多的类书《艺文类聚》，成于南方人欧阳询之手，其所收主要为南人之作，更不足怪。甚至出身弘农杨氏的作家杨炯在《王子安集序》中批评当时一些文人说：“好异之徒，别为纵诞，专求怪说，争发大言，乾坤日月张其文，山河鬼神走其思。长句以增其滞，客气以广其灵，已逾江南之风，渐成河朔之制。”孔颖达和杨炯都是北方人，尚且这样对待北方的学术文化，这就关系到一个时代的风气的背景了。不过，从杨炯的话看来，他虽然不赞成“河朔之制”，却也承认“河朔”文风与“江南”存在着不同。这个问题似可进一步探讨。在这里，笔者想试图从现有材料提出一些看法，来分析南北文风不同的原因。

## 第一节 南北文风异同说的提出

南北朝时代南北文风有别的说法，是古人早已指出了的。较早地提出这一看法的是《隋书·文学传序》，原文云：

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闻其风者，声驰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官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主持《隋书》修撰工作的是唐初魏徵，他出身于北方士族，却又兼擅诗歌和应用文字。他在叙述南北文风时，既要符合于南北文学发展的实况，又不得不考虑到北魏中期以前在文学方面基本上没有产生什么作家作品的事实而使北方士族太失体面，因此这段叙述不能不从北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开始大力推行汉化后说起。所以他对自汉迄刘宋的文学情况只能轻轻地一笔带过，说到南朝文学，也只从江淹、沈约和任昉讲起，连卒于南齐时的谢朓、王融等人也没有提到。他这样的做法，也有其理由。因为《隋书》的修撰是在唐初，而南朝诸史中，《宋书》成于齐梁间的沈约，《南齐书》成于梁代的萧子显，北朝诸史中《魏书》成于北齐的魏收，都在唐以前；至于南朝的《梁书》和《陈书》、北朝的《北齐书》和《周书》则也都成于唐初，和《隋书》差不多是同时修撰的。这样做可以避免和前人的重复，却又避开了北魏中期以前文学衰微的阶段。然而这只能在文字上给人一个南北并重的印象，还是避免不了问题的实质。因为北方自从西晋灭亡以后起，由于各族军阀的割据和混战，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比较稳定的文化中心，再加上汉族士大夫与各族军阀间的心理隔阂，由战乱频繁所造成的村居生活等复杂的情

况,纵使有人想致力于文学创作,也往往受到诸如典籍缺乏、交流困难等的限制,很难使其文学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提高。而且即使这些村居的士大夫中确实产生了比较优秀的作品,也会因为缺乏交往和传播,只能藏在家中,而在当时战乱频繁的条件下,私家藏书更易在兵火中散失。即使未遭兵火,也会由于后人的不加珍惜而丢失。如《魏书·崔玄伯(宏)传》:“始玄伯因苻坚乱,欲避地江南,于泰山为张愿所获,本图不遂,乃作诗以自伤,而不行于时,盖惧罪也。及浩诛,中书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始见此诗。”这首诗究竟有多高的艺术价值,这很难说,但它毕竟还是保存不下来,说明在北朝,作品的保存是何等不易。所以从十六国时代一直到魏孝文帝以前,各种学术著作和文学创作,几乎寥若晨星。由于缺乏传统的凭借和参照,即使在北朝后期,文学创作已初步兴起之后,还是很难和南朝相抗衡。这一点,北齐魏收在《魏书·文苑传论》中就丝毫不否认这一事实,他认为在北魏之末,尽管“文雅大盛”,仍是“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不过,数量和质量之间总是有着辩证的关系,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多起来,又有了像洛阳和后来的邺城这样的文化中心,也就使文学的发展和提高的条件大为改善。据唐代来到中国的日本僧人空海在《文镜秘府论·四声论》中引隋人刘善经的话说:“从此以后,才子比肩,声韵抑扬,文情婉丽。洛阳之下,吟讽成群。及从宅邺中,辞人间出,风流弘雅,泉涌云奔,动合宫商,韵谐金石者,盖以千数,海内莫之比也。郁哉焕乎,于斯为盛。”这段话对北朝后期文学的成就似乎有些夸大,认为“海内莫之比也”,似乎此时北齐文学已经超过了南朝,恐怕未必尽然。平心而论,到了南北朝后期,北方文学确有其特色,不但不是一片荒漠,也不能说完全是南朝文学的附庸。但是,当时的北方文人,由于齐、周的对峙,北齐文人和北周文人对待南方文风的态度有所不同。刘善经和魏徵都是北齐人的后裔,《隋书·文学传序》中在批评了萧纲、萧绎、徐陵、庾信之后,又说:“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这几句话是反对南朝文风,也是对庾信、王褒的否定。正因为北齐文士这样评价南朝和庾信,因此刘善经所说的邺下文人“海内莫之比也”,正是河朔文人的观点。我们应该承认,这时期北朝作家在形式和技巧方面基本上模仿南朝,较少创新;但由于他们不像南朝后期文人那样享受优厚待遇,终日诗酒流连,而是更多地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有的甚至还经历过戎马生涯,对现实的感受较深,因此文风确有其清刚雄浑之气,能反映更多的生活题材。这就使北朝后期文人的创作成就,从

总体上说,并不见得比南朝“宫体”诗人们逊色。所以一到隋代统一之后,像卢思道、杨素、薛道衡诸人的创作,实际上超过了出身南方的江总、虞世基诸人;就以帝王来说,隋炀帝杨广的诗,也还有一些佳作和名句,这比陈后主陈叔宝要高出一筹<sup>①</sup>。至于入唐以后,在一段时期内,较有成就的作家大多是北方人。这些现象说明刘善经和魏徵的话并非完全虚构,而有其事实根据。目前有些人因为我们过去对梁陈“宫体”的评价过低而要反其道而行之,竭力抬高“宫体”而贬抑北朝作品,则是大可不必的。评价一个时代的作品既不应把眼光局限在某些技巧方面,更应该看到北朝文学的清刚之气,确曾影响到盛唐诗人。因此探讨南北文风的异同及其融合过程,显然颇有必要。

近代以来,首先提出南北文风不同之说的,当推刘师培,他作有《南北学派不同论》,其中有一部分专论文学,称《南北文学不同论》,他在此文中畅论自魏晋至南朝齐梁的各大家并分作几大派别。然后,他又说:

梁陈以降,文体日靡。惟北朝文人,舍文尚质。崔浩、高允之文,咸磅礴自雄。温子升长于碑版,叙事简直,得张、蔡之遗规;卢思道长于歌词,发音刚劲,嗣建安之逸响。子才、伯起,亦工记事之文,岂非北方文体固与南方不同哉!自子山、总持,身旅北方,而南方轻绮之文,渐为北人所崇尚。又初明、子渊,身居北土,耻操南音,诗歌劲直,习为北鄙之声,而六朝文体,亦自是稍更矣。隋炀诗文,远宗潘陆,一洗浮荡之言,惟隶事研词,尚近南方之体。杨、薛之作,简符隋炀,吐音近北,摘藻师南。故隋唐文体,力刚于颜、谢,采缛于潘、张,折衷南体北体之间,而别成一派。唐初诗文,与隋代同,制句切响,言务纤密。虽雅法六朝,然卑靡之音,于焉尽革。

刘师培这段话,用简洁的文字综述了南北文风的差别和其融合过程,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对江总和沈炯二人的论述,似尚可商榷。江总入北在隋文帝灭陈之后,此时北朝文风已与南朝比较接近,薛道衡在陈亡前所作,已颇近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我们且不论《隋书·文学传》中提到的《饮马长城窟行》一类诗,即以《茗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艺苑雌黄》所记杨广佚句“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二句,已非陈叔宝所能及。

齐梁；而江总在北方时间并不久，又被准许南归，似对北方人并未产生影响。至于沈炯虽曾一度被扣留于关中，但他文风的变化，恐怕未必由于北朝人的影响。因为沈炯留在北方不过两年左右，据《陈书》本传，他在北方即使有作品，亦随即弃毁，根本不存在“耻操南音”的问题。沈炯文风的变化，恐怕应归结为生活经历的变化。因为南朝宫体诗人在经历侯景之乱后，也有人能写出比较苍凉悲壮的诗歌，如庾肩吾的《乱后行经吴御亭》这样的诗，就是明显的例子。又如迄今所见梁代诗人所作的四首《燕歌行》，萧子显之作就和战争无关，因为作于侯景之乱以前；庾信、王褒和萧绎三首乃同时所作，庾信和王褒已经历战乱，所以已具悲凉之气；而在江陵坐山观虎斗的萧绎之作，这种气息就远不如庾、王。这说明庾信和王褒的诗风变迁，实际上也不完全由于到了北方，而是生活经历本身的变化。沈炯确有些悲凉之作，但那是由北回南后痛定思痛之故，似不能把诗风变化完全归结为地区的原因。作品风格的变化总是由于其内容的变化，而作品内容又总是决定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个人经历。

刘师培关于南北文风不同的论述，有他的独到之处，那就是他并不局限于南北朝本身，而是一直上溯到先秦汉魏，并且指出了从汉魏以来北方文人和南方文人之间已经在融合而且保持各自的某些特色又互相影响的问题。但他的局限则在于过分地强调了地理环境的影响。他认为北方“土厚水深”，因此人们“多尚实际”；南方“水势浩洋”，所以人们“多尚虚无”。这实际上是继承了《管子·水地篇》的见解，用各地水土的差别来解释人们心理和性格的不同。这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务实和幻想都有其种种复杂的社会和个人的原因，绝非自然环境所能决定。“土厚水深”之区有时也可以产生玄虚的思想家及富于浪漫色彩的诗人；水乡泽国同样可以有实干家及写实的作家。有时在同一个人身上，在某一种状况下比较务实，而在另一种状态下则又多幻想的情况也不少。试想极富浪漫色彩的《天方夜谭》，出现在干旱的阿拉伯地区；而以经验主义为特色的哲学家却多出现于英国这样的海岛中，就说明了“务实”和“虚无”的问题很难用自然环境来解释。

关于南北文风的不同，的确由来已久，从先秦时代起，南方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就存在着不同。这是由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各地居民的种族成分等众多原因造成的。但这种不同不是绝对的，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各自不同的处境和个人教养、经历等因素。这些不同又常常由于交通频繁、互相争论及影响而趋向融合。一般来说，像哲学、文学等意识

形态部门，随着社会和这些学科的发展，越到后来，就越少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决定于社会及个人的因素。像我国的南北朝时代，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更难用自然环境来解释。当时南北文风的差别，主要在于两个政权的长期对峙，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产生许多差别，文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因之各个不同，不能不影响其创作风格。这种差别，恐怕还不限于南北两个地区，就是在南方和北方各地，也会有所区别。在这里，北朝著名的文学家邢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他说：

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原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北江南，意志本应相诡。（《萧仁祖集序》，见《全北齐文》卷三）

邢劭这篇文章已经残缺，他为什么提出这个论点，已难确考。我们知道：邢劭和魏收是北齐两大文学派别的首脑。邢劭爱慕南朝的沈约，而魏收则效法任昉，两人尽管争论得十分激烈，以致形成派别，但他们又都是南朝文人的崇拜者，他为什么在这里要强调起南北文风的差别来呢？笔者认为：邢劭这段话，可能是有所针对而发的。因为萧仁祖即萧慆，他有一首《秋思》诗，其中有两句非常有名，即“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这两句诗据《颜氏家训·文章》载，当时寓居北齐的南方文人如颜之推、诸葛颖等人都很赞赏，相反的，北方籍文人如卢思道等，却很不以为然。同样地，在南方深受推崇的梁代诗人王籍的“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两句，也遭到北方文人魏收等的反对。这说明北朝文人的艺术趣味和南朝不同。萧慆是流寓北方的梁代宗室，他请邢劭给文集作序，不但说明他的文学见解与邢相近，还可能有借重邢劭在北方的威望之意。邢劭在这篇序中称赞萧慆的作品“可谓雕章间出”，接着就论南北文风应该有别。这用意可能是在两种意见之间进行调和。邢劭的论点，实际上已经说明了一点，即既应承认不同的存在，又要看到对方的长处而加以吸取。在这方面，魏收的意见可能不完全一样，因为邢劭崇拜沈约，推崇沈约提出的“易见事”、“易识字”和“易读诵”；但魏收仰慕任昉，任昉作诗好用典。像萧慆、王籍的名句，都不用典。然而魏收作文虽学任昉，诗却很讲究雕藻，他的《棹歌行》、《挟瑟歌》诸作，其实也富有南方诗歌的色彩，只是像《棹歌行》，就暗用了陶渊明《桃花源记》和晋陶侃在武昌种柳的典故；《挟瑟歌》中“白马金鞍”来自曹植《白马篇》，

“红妆玉箸”又和梁刘孝威《独不见》中同用“玉箸”典，疑皆有所本。这种诗风亦与南朝无甚区别。他和邢劭的争论，实际上不过是意气之争，不完全反映南北文风之争。据唐刘悚《隋唐嘉话》载，徐陵出使北齐南归时，魏收曾把自己文章交徐陵带到江南为他扬名，但徐陵竟投入江中，说是“为魏公藏拙”。这故事也许出于传说，但至少反映出这样的情况，即北方文人还在虚心学习南方，而南方文人却仍对北方文人有些轻视。这是西晋灭亡以来长期分裂的结果。

## 第二节 关于南北文风差别的时间断限

在文学史上，各地文风的统一和区别都是相对的。一般说来，在国家处于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下，文风就会趋向统一，在这种条件下，文风也就趋向一致，即使某些地区之间存在着小的差异，那也只是个别文人集团之间在若干问题上的见解分歧，与南北之别无关，而且有些学派或文派虽以地区命名，而这些派别的成员也往往未必出身该地。在割据分裂的局面下，由于各地社会状况、生活方式等客观情况的不同，也会促使文风发生显著的地区差异。但这种差异，也会由于使节和商贾的频繁来往，书籍及各种艺术形式的交流，造成彼此互相影响而逐步走向融合的趋势。这种互相影响而日趋融合的情况，早在秦始皇并吞六国，实现大一统局面之前已经开始了。近年来考古方面的发现，证明了许多远离中原的地区，其出土的文物已明显地受到中原商、周文化的影响。例如：在春秋时代，楚国是被看作“蛮夷”的。但《左传》和《国语》中都记载在楚国的君主和群臣中，有许多人都很熟悉中原古代的文化。如《左传》载，楚庄王在邲之战大破晋军之后，曾向臣下大谈《周颂》的内容；《左传》还曾讲到楚国的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国语·楚语》中讲到了楚国教育贵族子弟的教材，很多是周代的典籍；左史倚相还讲述过卫武公的事迹，等等。在当时看来比楚国更僻远的吴国还产生了季札这样熟悉周文化的人。到了战国，南北的交通尤为频繁，楚国似乎也不再被看作蛮夷了。《孟子》所载的《沧浪歌》已属骚体，并且亦见于《楚辞·渔父》，这是南风北渐的明证；至于孟子对陈良的称赞，却又说明了儒家学说已在楚国流行，所以屈原作品中存在着明显的儒家思想色彩，决不是偶然的。后来荀况作为一个地道的北方人，却终老于南方；他的弟子李斯是楚国人，却又是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主要人物。这些都说明了

即使在割据状态下，文化上的融合和认同的趋势仍然是主流。但另一方面，各个地区的特色和传统，即使在统一的皇朝下，仍然可以存在，所以汉初物色治礼作乐的人物，还得到鲁地寻访；而汉代治《楚辞》的人，又大多在楚国的旧地。不过，这是统一时间还较短之故，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种差别也会趋于消失。例如，汉代关于“五经”的传授，并不都起于孔子家乡的鲁地，而是散在各个地区，如《公羊传》被称为“齐学”，“韩诗”出于燕人韩婴，“毛诗”出于赵人毛萇，而传《易》的施雠、孟喜一个是沛人，一个是兰陵人，在战国时均属楚地。这是因为战国儒家，本是“显学”，早在秦统一以前已普及全国各地。这正如在大一统局面出现之后，还是会有像佛教中禅学和艺术方面的绘画均有“南宗”、“北宗”之别一样，但这种南北之别，仅仅意味着学派创始人的籍贯或居住地，和这一派别的众多成员无关。又如书法方面，有“碑”和“帖”的区分，学碑者多效法北魏碑志，学帖者多师法东晋王羲之父子，但学碑体的未必都是北人，学帖体的也不一定是南人。因此就总的倾向而论，在秦汉以后，不论学风和文风都以认同和融合为主导倾向，至于南北朝和宋金对立时所出现的文风差别，实际上只是当时政治形势所造成的，其表现形式虽有很大差异，但从语言和心理素质方面说还是大同小异，只是在一个时期以内，在艺术技巧方面和反映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所以刘师培在论南北文风的不同时，虽不局限于南北朝，而一直上溯到汉魏和先秦，但对统一的秦汉时代，就谈得较少，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先秦时代的文风，也有过南北之别，但这是统一以前的事，其原因与南北朝很不相同。秦汉统一以后，南北文风已经实现了融合，所以汉魏作家实在已经很难说谁是纯粹的南方文风，谁又是地道的北方文风。即以三国分裂之后而论，在西晋作家中，傅玄是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人，陆机是吴（今江苏苏州）人；一个由魏入晋，一个由吴入晋，身世完全不同。二人的诗歌当然有区别，但这种区别就很难说主要是由于地区的不同，而更多是因为各人经历和性格的差异。像傅玄的《吴楚歌》，就纯属“骚体”。以散文而论，羊祜《让开府表》和李密《陈情表》，也只是个人之间的差别，看不出魏、蜀之分。又如刘师培所举南方文风中各派的代表人物，情况也很复杂，如他把东晋的孙绰、许询算作南文之一派，但孙绰祖籍太原，许询祖籍高阳（今属河北），都是北方人；颜延之、谢灵运、鲍照等人的祖籍亦属北方。尤其是孙绰的祖父孙楚，刘师培认为是和刘琨、卢湛一样是“北方文人”的代表。其实从西晋末到东晋中期，孙氏的家学并未断绝。《世说新



语·文学》记载，东晋时褚裒对孙盛论南北学术的不同，把孙盛作为北方学术的代表。孙盛和孙绰是堂兄弟，而他们一个作为北方学风的代表而一个却是南方文风的代表，这也说明所谓南北朝以前的南北学风和文风的不同，不全在于籍贯。至于南北分裂以后，籍贯和居地就成了比较重要的因素。更可以令人注意的是在南北分裂的几个阶段中，文人的居住地区往往会对他的创作起着非常不同的作用。例如，西晋末年从洛阳避地到冀州的作家左思和因战乱避祸回故乡安平（今属河北）的张载、张协兄弟，都是当时杰出的作家，但他们的作品流传至今者大抵都作于离开洛阳之前，似乎左思一到冀州，张载、张协一回安平，就此销声匿迹，再无一字流传。我们很难断言三人离开洛阳后不久都已去世或从此搁笔不再写作。相反的，从故乡闻喜（今属山西）避难到南方的郭璞，其有价值的作品差不多是入南以后所作，至于从家乡闻喜经盐池等地过洛阳南下途中所写的赋，作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状况及郭璞个人的生平，不失为很重要的资料，但其文学价值都算不得上乘。至于他的《尔雅注》、《山海经注》等学术著作，亦完成于入南之后。这时留居北方的作家，只有刘琨和卢谌二人有作品传世，而他们的作品却显然多数为温峤奉命到江南去时带去的，只有刘琨《赠卢谌》的那首五言诗（“幄中有悬壁”）可能是他死后卢谌、崔悦上表晋帝为刘琨鸣冤时派人送到南方，由晋代官府保存下来。至于《晋书·刘琨附刘群传》载，温峤上表所称“姨弟刘群、内弟崔悦”等人，“并有文思”，但他们的作品，也没有得到保存。这也不能说这些人从来都没有写过文章。至于刘宋后期，由于今山东一带落入北朝手中而入北的人，情况就有所不同。例如，刘芳入北以后，就成了北方的经学大师，有“刘石经”之誉。他虽然不是作家，却说明此时北朝对学术和文化已比较重视，和北魏初年大有不同。至于年纪小于刘芳的文人刘孝标，在北方时不论学术和文艺都不见有什么贡献，但到南方后，在学术和诗文方面都有很突出的成就。刘孝标是在宋明帝泰始初年入北的，当时年八岁，当生于宋孝武帝大明三四年（459—460），他于齐武帝永明年间还南，这时年已二十多岁，文化教养当已在北方时奠定基础。据说他回南后自以学识不博，又曾努力读书，但这只能是加深修养。这说明当时北方的情况比东晋初年已有变化，而学术和文艺的水平比起南方来还有逊色。到了南北朝后期，情况又有所不同。北朝温子升的作品传到南方，得到了梁武帝的赞赏，比之为曹植、陆机；邢劭的文学才能也颇为南方人所知。又如陈代作家张正见，本是北方人，他父亲在梁代入南，估计此时张正见已经出生。他的文风